

#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对历史唯物主义自然观的辩护

刘英

(安徽中医药大学 人文学院,安徽 合肥 230038)

**摘要:**针对西方绿色思潮对历史唯物主义自然观反生态性的诘难,通过揭示生态中心主义自然观和现代人类中心主义自然观的理论缺失,深入挖掘了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自然观的生态意蕴。研究认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批判了生态中心主义的反理性主义、反技术主义倾向,揭示了生态中心主义自然观在自然价值论和自然权利论的理论困境,认为生态中心主义将生态问题的根源归咎于个人对环境的价值观和态度,这种观点是非历史主义的和唯心主义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批判了现代人类中心主义仅从价值观层面探导生态问题而忽略了价值观依存的社会制度和社会历史条件,认为现代人类中心主义自然观坚持自然对人类而言只具有工具价值,是脱离了一定社会结构和历史条件的抽象的近代机械自然观,其追求的人类整体利益和人类长远利益只是一种幻想;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对历史唯物主义自然观的辩护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认为历史唯物主义自然观指认自然异化的根源在于社会生产方式,主张通过变革社会制度和生产方式来消除自然的异化、解决生态问题,提出历史唯物主义兼具自然维度和文化维度,坚持了自然的先在性和社会历史性,坚持了人的自然性和社会性,始终坚持了唯物主义自然观与历史观的辩证统一;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对西方绿色思潮自然观和历史唯物主义自然观的理论性质作了准确定位,主张把文化和自然因素引入到历史唯物主义中,构建了文化历史唯物主义自然观理论,是强调人与自然辩证统一的自然观。

**关键词:**自然观;生态中心主义;现代人类中心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生态学马克思主义

**中图分类号:**B08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1-6248(2017)01-0065-08

## Ecology Marxism's defense on historical materialism view of nature

LIU Ying

(School of Humanities, Anhui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Hefei 230038, Anhui, China)

**Abstract:** Aiming at the interrogation of western Green Thoughts towards the anti-ecology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view of nature, this paper explored the ecological implication of ecology Marxism

收稿日期:2016-11-24

基金项目:安徽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项目(SK2015A375)

作者简介:刘英(1979-),女,湖南岳阳人,讲师,哲学博士。

historical materialism view of nature by revealing the lack of theory in ecology centralism view of nature and modern anthropocentrism view of nature. The results show that ecology Marxism not only criticizes the anti-rationalism and anti-technology tendency of ecology centralism, but also reveals its theoretical predicament of the natural value theory and the natural right theory. It believes ecology centralism roots the ecological problems to the personal value and attitude to environment, which is non-historism and idealism. Ecological Marxism also criticizes that modern anthropocentrism explores ecological problems only from the view of value, instead of from the social system and social historical conditions in which values are interdependent. modern anthropocentrism view of nature insists that nature only has the instrumental value to mankind, which is abstracted from the certain social structure and historical conditions of abstract modern mechanical view of nature. Therefore, its pursuit of human overall interests and human long-term interests is only fantasy. The defense of ecology Marxism on historical materialism view of nature adheres to the basic stand of Marxism. Historical materialism view of nature identifies the root causes of natural alienation to the mode of social production, advocating by changing the social system and mode of production to eliminate the natural alienation and to solve the ecological problems. It also points out historical materialism has both the natural dimension and the cultural dimension, insisting on preexistence and social historical nature, insisting on human nature and sociality, and always insisting on the dialectical unity between natural materialism and historical materialism. Ecology Marxism makes accurate position on the theoretical nature about western Green Thoughts view of nature and historical materialism view of nature, and advocates the cultural and natural factors into historical materialism. It constructs cultural and historical materialist view of nature theory, which emphasizes the dialectical unity between nature and human.

**Key words:** view of nature; ecology centrism; modern anthropocentrism; historical materialism; ecology Marxism

面对全球性日益严重的生态问题,西方绿色思潮批判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自然观的反生态性,他们试图用生态中心主义自然观或现代人类中心主义自然观取代历史唯物主义自然观,以此走出生态困境。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通过揭示生态中心主义自然观和现代人类中心主义自然观的理论缺陷,为历史唯物主义自然观展开了有力的辩护<sup>[1]</sup>。本文旨在系统地论述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对历史唯物主义自然观的辩护及其理论特质。

## 一、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对生态中心主义自然观的批判

生态中心主义以利奥波德、罗尔斯顿和奈斯为代表,他们在自然观上坚持自然价值论以及自然权

利论,反对一切形式的人类中心主义,主张与自然和谐共处<sup>[2-4]</sup>。生态中心主义自然观的上述主张受到了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的严厉批评,他们不仅揭示了生态中心主义自然观的理论困境,而且揭示出生态中心主义自然观的后现代特征,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同时批判了生态中心主义探寻生态问题的理论主张。

第一,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揭示了自然价值论和自然权利论的理论困境。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指出,自然价值论面临着如何从事实认知推出价值判断的理论难题。在生态中心主义者看来,自然的价值是自然本身就具有的,是客观存在的,正因为自然价值的客观存在,人与自然之间存在着一般的伦理关系。基于此,生态中心主义者认为完全可以从“是”中推导出“应该”来,因为“实然之道蕴含着

它的应然之道”<sup>[5]</sup>。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指出,生态中心主义者把价值等同于事实,这是他们最根本的理论困境。事实和价值存在着联系,并非截然两分,但是生态中心主义把它们等同起来,是不可取的。不仅如此,生态中心主义必须论证自然价值和自然权利的客观性。为此,生态中心主义者把生态系统构成要素的价值等同于它们的存在本身,这种论证方法不仅犯了前面所说的把价值论等同于存在论的错误,而且把自然作为评价主体去评价价值的内在属性,这是不可能作出客观评价的。除此之外,生态中心主义对自然价值论和自然权利论客观性的论证并不是建立在科学的研究和严密的推理基础上,而是归结于人的直觉,这种作法很难保证理论的科学性和严密性。除了上述难题外,生态中心主义还需面对如何定义自然价值和自然权利的挑战。在生态中心主义者那里,这两个概念没有严格统一的规定。在定义自然价值概念时,他们要么认为自然价值就是一种“内在价值”和“客观价值”;要么认为自然价值是指自然物的内在结构和属性;要么认为自然价值就是生态系统的创造性。对于什么是自然权利,他们强调非人类存在物具有与人平等的,包括生存权利和自主权利在内的道德权利,这种道德权利应该得到人们的尊重。可见,生态中心主义者把本属于人的价值和权利概念不仅做了宽泛的解释,而且推广到非人类存在物上,但这种尝试未必是成功的。

第二,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指认生态中心主义自然观具有后现代特征。生态中心主义主张“非人类中心主义”,反对理性主义,反对科学技术,使其理论具有鲜明的后现代特征。对此,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展开批判性分析。在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看来,生态中心主义对人类中心主义的强烈反对,具有后现代反主体的特征。人类中心主义本身并没有错,在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时,如果不是把人而是把生态自然放在中心地位,势必会带来各种反人道主义的体制。其一,在对待人类理性方面,生态中心主义者指认生态危机缘起于人类理性的骄横和对自然的控制,提出必须消解人类理性和批判“控制自然”观念。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一方面强

调不能消解理性主义,而是应该探讨如何正确地发展理性主义,使理性主义的优势充分体现;另一方面指出“控制自然”并不意味着对自然的侵犯,而是在掌握自然规律前提下的有意识的合理控制。其二,在对待科学技术方面,生态中心主义者目睹科学技术在现代社会中使用产生的诸多负面影响,他们反对科学技术,主张放弃技术,使人类退回到前技术时代。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批判了生态中心主义的反技术主义倾向,强调应该在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和具体的社会结构中看到科学技术所带来的消极作用和负面影响。可以说,当今社会的生态危机根本不是科学技术本身的危机,而是资本主义制度和生产方式以及这种制度对科学技术的不合理使用方式的危机。

第三,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批判生态中心主义分析和解决生态危机的理论主张。生态中心主义把生态危机产生的根源归咎于建立在人类中心主义基础上的传统伦理价值观,提出要解决生态危机,必须抛弃人类中心主义立场,承认非人类存在物的“自然价值”和“道德权利”。对此,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展开了严厉的批判。在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看来,生态中心主义将生态问题的根源归咎于个人对环境的价值观和态度,这种观点是非历史主义的和唯心主义的,即生态中心主义把自然看作是一个抽象的概念,根本没有看到自然的社会历史性;把生态问题唯心主义地归结为世界观和价值观问题,看不到生态问题背后所隐藏人与人之间的利益矛盾问题,因此无法真正找到产生生态问题的根源。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指出,我们应该从资本主义制度和生产方式中去探寻生态危机的根源。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利润最大化”的资本逻辑伙同消费主义价值观,以及发达资本主义向第三世界国家推行的“生态殖民主义”,实施非正义的“生态掠夺”等才是全球生态危机产生的罪魁祸首。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不仅批评了生态中心主义者对生态问题根源的探寻,而且批评了生态中心主义者对生态问题的解决方式。对生态中心主义者来说,未来社会生态问题的解决只需要改变人们的价值观,即用一种生态中心主义的价值观看待自然以及自然与人的

关系,培养一种对大自然的“生态意识”。福斯特对此提出了反对意见。他认为,当今最紧迫的问题并非改变人类的价值观,而是毫不留情地揭示并消除资本主义制度的非正义性,打破以资本逻辑为基础的全球权力关系,惟有如此才有可能解决生态问题,在一个非正义的社会制度下,即使个体的生态道德得到明显提升,也无益于生态问题的根本性解决。同样,戴维·佩珀也认为,生态中心主义过分地迷恋个人的态度、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的改变,并把它们看成是促进社会变革、解决生态问题的主要动力,注定是要失败的。因为现有社会制度以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固有的巨大力量才是解决生态问题所面临的巨大阻力。

总之,在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看来,生态中心主义自然观抽象地和非历史性地看待自然以及“人与自然的关系”,忽视了生态问题产生的社会现实根源,因而无法在实践中找到解决生态问题的根本途径。

## 二、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对现代人类中心主义自然观的批判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不仅批判了生态中心主义自然观,而且批判了现代人类中心主义自然观。现代人类中心主义主要以墨迪的“现代人类中心主义”和诺顿的“弱式人类中心主义”为代表<sup>[6-7]</sup>。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指出,无论是现代人类中心主义还是弱式人类中心主义,都具有鲜明的内在缺陷,这些内在缺陷决定了它不仅依然是一种与资本紧密联系的近代机械自然观,而且不能真正解决生态问题。

第一,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揭示了现代人类中心主义自然观的内在缺陷。在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看来,无论现代人类中心主义如何鼓吹人类整体利益和人类长远利益,它依然是抽象地看待人与自然的关系,因此,根本无益于生态问题的解决。现代人类中心主义坚信“生态化”的资本主义制度是可以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由此可见,现代人类中心主义与资本主义现代化是相容的,它有可能沦为资

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内在组成部分,这种内化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现代人类中心主义不仅不能解决生态危机,而且有可能与资本相结合加剧生态问题的产生。此外,现代人类中心主义所追求的人类整体利益在现实中是无法实现的,因为根本不存在抽象的人类整体利益。在现有资本全球权力框架中,现代人类中心主义打着人类整体利益的旗号,实则维护着以资本为核心的阶级利益和国家利益,人类整体利益根本无从谈起,因此它是一种赤裸裸的地区中心主义和阶级中心主义。不仅如此,现代人类中心主义自然观要求以人类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为基础,在资本主义制度和资本全球权力范围内是无法真正落实于实践来解决生态问题的。之所以这样,不仅是因为现代人类中心主义所追求的人类整体利益和人类长远利益虚无缥缈,无从实现,而且当代全球范围内的生态问题实质上是资本全球化的产物。在全球化背景下,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依仗其雄厚的经济实力和政治优势对发展中国家进行“生态殖民主义”,加剧了生态问题的恶化和社会不公正。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强调,探寻生态问题需要全球性视野和全球性行动,现代人类中心主义对虚无缥缈的人类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的追求只是一种乌托邦式的幻想,他们提出的解决生态问题的理论主张只可能是纸上谈兵。

第二,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指认现代人类中心主义自然观实质是一种近代机械自然观。在对待自然问题上,近代机械论明确指出,自然是上帝创造出来的,它是一个按照客观数学规律运行的冷漠的和无趣的世界。现代人类中心主义不仅认为自然对人类而言只具有工具价值,而且认为自然只是独立于人之外的客体,完全忽视了被人类改造过的自然所具有的社会历史性特征。由此可见,现代人类中心主义自然观在对待自然方面仍然是一种近代机械自然观。在对待人与自然的关系上,近代机械自然观继承了西方哲学中主客二分的认识传统,指认人与自然的关系其实就是一种主客关系。现代人类中心主义强调人与自然关系中人的主人翁地位,人类可以按照自己的喜好和需求控制自然,但是人类控制自然的能力终究要受到理性思维的

制约,否则生态问题随之出现。可见,现代人类中心主义所理解的人与自然的关系,只不过是一种建立在人类利益和需求基础上的,控制与被控制的主仆关系,它仍然没有跳出传统哲学主客二分的窠臼。在对待科学技术问题上,近代机械自然观十分推崇科学技术的作用,甚至把科学技术的进步等同于社会的进步,但是它没有关注到科学技术运用所带来的负面效应。现代人类中心主义虽然注意到了科学技术所带来的负面效应,但它坚信只要以人类理性的方式操控自然,在现有制度框架下通过技术进步和技术革新就能够解决生态问题。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指出,无论是现代人类中心主义自然观还是近代机械自然观,他们都是脱离一定的社会结构和历史条件抽象地谈论“控制自然”观念和科学技术的效应问题,根本看不到“控制自然”观念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是与资产阶级“控制人”的观念紧密结合的,因而不能正确地理解“控制自然”的真正内涵,无法对现代科学技术的本质作出正确的评价,正是在这一点上,现代人类中心主义自然观和近代机械自然观在本质上是一致的。

第三,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批判性地分析了现代人类中心主义自然观与生态危机。在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看来,现代人类中心主义自然观和生态中心主义自然观一样,缺乏一种历史唯物主义视角,它们仅仅从抽象的价值观层面探寻生态问题,忽视了价值观所依存的社会制度和社会历史条件,因而无法建立科学的生态自然观。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现代人类中心主义自然观建立在资本利益之上,已经成为资本主义价值体系的一部分,这就决定了它在探讨生态问题时,只不过是一场“贼喊捉贼”的游戏。另外,现代人类中心主义在资本主义制度和资本全球权力关系范围内,缺乏实践的可操作性,只能是一种乌托邦式的幻想。在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看来,人类本身并不是生态危机的原因,真正的原因在于资本主义制度以及资本的全球权力分工。如果不变革这种资本主义制度,不打破这种以资本为核心的全球权力关系,一切解决生态问题的途径都只是枉然。基于此,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指出,生态问题的分析和解决不能离开人类立场,对此,

格伦德曼、戴维·佩珀和休斯都作出了分析。格伦德曼认为,人类在分析生态危机和反思对待自然的现代态度时,绝对不能够放弃“人类的尺度”。戴维·佩珀指出:“生态社会主义是人类中心论的(尽管不是在资本主义—技术中心论的意义上说)和人本主义的。”<sup>[8]</sup>休斯发现人类中心主义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并断言马克思主义就是这种广义的人类中心主义<sup>[9]</sup>,与现代人类中心主义不同,这种广义的人类中心主义能够为保护自然提供理论支撑。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从历史唯物主义视角批判了现代人类中心主义自然观的内在缺陷,指出建立在资本利益基础之上的抽象的现代人类中心主义自然观不仅无法解决生态危机,反而会引发生态危机。人类只有立足于真正的人类中心主义立场,打破资本全球的权力关系,变革资本主义制度和生产方式,才能真正走出生态危机的困境。

### 三、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对历史唯物主义自然观的辩护

基于对生态中心主义自然观和现代人类中心主义自然观的批判,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明确指出,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和生态学并不是对立的,历史唯物主义自然观具有生态意蕴,以此为基础,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展开对历史唯物主义自然观的辩护。

第一,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深入挖掘历史唯物主义自然观的生态意蕴。在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看来,历史唯物主义自然观对自然概念和人类社会与自然关系的看法,以及如何克服自然异化的观点都包含着一种生态学的关注。历史唯物主义有一个现代性的自然概念。格伦德曼认为,马克思关于自然的观念具有浓厚的现代气息,它可以追溯到皮科、培根以及黑格尔,并延伸到尼采。马克思还发展了一种独特的对待自然的现代性观点,即把自然看作是具有某种功用性的物体,它可供人类利用以满足人类的需要和欲求。在这个物质世界中,人类为了生存,必须“控制自然”。自然在马克思那里不是拟人的,它自身没有目的,只是人类将其需要和欲求强加于它,因此人类对自然的控制不是以一种

肆意的方式进行的,而是必须尊重自然的规律。历史唯物主义自然观不仅强调自然概念的现代性,而且强调人类社会与自然之间的辩证关系。戴维·佩珀对此进行了详细的论述。在戴维·佩珀看来,人与自然不可分离,人类通常与自然处于一种统一和斗争状态中,自然往往以一种与人敌对的态度存在着,人类既依赖于自然生存,又要与自然作斗争。劳动是人类与自然发生相互作用的中介,人类在生产劳动过程中,毫无保留地把自身的力量倾注于自然,其结果是,人在被自然化的同时自然也被人化了。人类社会和自然相互改造,即当人类通过生产改变自然时,也改变他们自己,即人类的自然。随着我们对自然改造的不断深入,我们开始懂得应该去了解自然规律,以便更有效地改造自然,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同时发展了自己的智力。此外,历史唯物主义视野中的自然是一个社会概念,是社会历史文化的产物,自然的异化意味着自然在人类社会实践中从自身分离,它被视为一个社会产物的失败,自然的异化其实就是社会生产方式的异化。要消除自然的异化,就必须消除社会的生产方式对自然的非理性控制,重新规范自然对整个社会的用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认为历史唯物主义自然观指认自然异化的根源在于社会生产方式,主张通过变革社会制度和生产方式来消除自然的异化、解决生态问题,这种对自然异化的观点是建立在人类-社会关系一元论基础之上的。

第二,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提出,历史唯物主义不仅具有自然维度,而且具有文化维度。对此,詹姆斯·奥康纳作出了详细的论述。詹姆斯·奥康纳指出,要充分重视自然在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中的地位,并将历史唯物主义的内涵向外扩展到物质自然界之中。自然界的能动性和自主运作性是自然的特性,自然界虽然是人类实践的结果,但是它具有自身的运动规律,自然本身的运动规律是客观存在的。詹姆斯·奥康纳不仅强调自然的自身运动规律是客观存在的,而且强调自然界的自身运动规律和内在属性还会对人类的实践活动产生影响。除此之外,詹姆斯·奥康纳认真考察了生产力、生产关系的自然和文化维度。对于生产力、生产关系

的自然维度,詹姆斯·奥康纳认为,自然系统不仅内在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中,而且自然系统的内部发展趋势和发展规律将会对人类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产生影响。不仅如此,自然系统的内在发展趋势和内在规律也会影响到社会形态和阶级结构的形成和发展,并产生一定的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文化维度看,詹姆斯·奥康纳指出,文化在前苏联马克思主义那里只是社会上层建筑的一部分,这就直接导致了前苏联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生产力、生产关系以及社会劳动等概念缺乏一个文化的视角。从文化视角来看,不管是生产力还是生产关系,它们都与一定的文化规范和文化价值观融合在一起,也就是说,特定历史条件下的文化价值观和文化传统对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形成和发展具有一定的影响作用。不仅是劳动力,而且包括劳动协作方式都是在一定的文化传统下进行,并受到这些文化传统的影响。此外,詹姆斯·奥康纳还考察了社会劳动的自然和文化维度。他指出,人类的生产劳动既受到自然的影响,是一种物质性的实践,又受到文化的影响,是一种文化实践。一方面,人类的生产劳动被赋予了自然的特征,自然的客观规律制约着人类的生产劳动。另一方面,社会劳动被赋予了文化的特征,特定社会结构中的文化规定和文化实践是社会劳动的建构基础,而文化规定和文化实践反过来又被社会劳动的形式所决定。

第三,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始终坚持历史观和自然观的辩证统一。在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看来,自然生态系统与人类社会系统相互影响,自然生态系统制约人类的实践活动,而人类通过社会劳动调节和控制自然生态系统,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所建构的历史唯物主义自然观正是建立在强调人类社会与自然生态系统辩证联系的基础之上的,以历史观与自然观的辩证统一为其理论特征。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指出,历史唯物主义自然观坚持自然的先在社会历史性。自然界及其自然规律是不依赖于人的一切意识和意志而独立存在的,自然及其自然规律具有先在性、客观性、制约性。人类只有不断地认识自然,自觉地遵循自然规律,才会使自

然向着有利于人类社会的方向发展。在整个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人类通过社会劳动把自然带入到他们的视野。人类不断地利用自然,改造自然,使自然具有社会历史性。历史唯物主义不仅强调自然的先在性和社会历史性,而且坚持人类的自然性和社会性。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指出,“人类既是自然存在物又是社会存在物”<sup>[10]</sup>,人类具有自然性和社会性双重特征。一方面,人类作为拥有生理需要的自然存在物,像其他所有生物体一样,能够仅仅存在于自然环境中,人类不仅依赖于自然界并且受到自然规律的制约,人类还可以通过劳动利用自然、改造自然,使自然满足人类的需要。另一方面,人类同样也是社会存在物,他有别于其他生物体,人类通过“有计划意识”活动与自然进行“物质变换”,而且这种“物质变换”也发生在人类与他人的相互关系中。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强调,人类具有自然性和社会性,人类不仅与自然发生关系,而且人类与人类之间也会发生关系,人类与自然的的关系以及人类与人类的关系始终贯穿在马克思的整个著作中,人与人的关系受制于人与自然的关系,又决定人与自然的关系,因此,人与自然以及人与人的关系是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的。历史唯物主义关于人的自然观和历史观是辩证统一的。

总之,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通过强调自然的先在性和社会历史性以及人类的自然性和社会性,实现了人类-自然的关系以及人类、自然-人类、人类关系的辩证统一。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始终坚持历史唯物主义自然观与历史观辩证统一,在此基础上探讨生态危机的根源和解决之道,体现了其鲜明的理论特征。

#### 四、评论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揭示和批判了生态中心主义自然观和现代人类中心主义自然观的理论缺陷。基于此,他们深入挖掘历史唯物主义自然观的生态意蕴,并提出用自然和文化维度重构生产力、生产关系和社会劳动等概念,坚持历史唯物主义自然观和历史观的辩证统一。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对

历史唯物主义自然观的辩护坚持的是马克思主义立场,具有如下基本特点:

第一,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对西方绿色思潮自然观和历史唯物主义自然观的理论性质作了准确的定位。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把生态中心主义看作是具有后现代性质的绿色思潮,把现代人类中心主义自然观看作是建立在资本利益基础之上的近代机械自然观,而把历史唯物主义自然观看作是对资本主义制度的生态批判,认为它是现代主义和理性主义的。生态中心主义自然观的后现代性质体现在它反对人类中心主义、反对科学技术,反对理性主义,主张自然价值论和自然权利论等方面;现代人类中心主义自然观之所以说是一种近代机械论自然观,是因为它把自然看作是与人类相对立的客体,人与自然的关系建立在二元论基础上,其自然仍然是与资本结合在一起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对历史唯物主义自然观的辩护是现代主义和理性主义的。一方面是因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自然观并不抽象地反对人类中心主义和科学技术的运用,它反对的是人类中心主义和科学技术的资本主义运用,强调生态危机的解决仍然需要坚持人类中心主义价值立场,强调科学技术的合理使用有利于生态危机的解决。另一方面是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自然观强调人类对自然的“合理控制”,对自然的控制是建立在满足人的基本需要,满足人类的利益和需求基础之上的,因此,历史唯物主义自然观并不反对经济增长,不主张对工业实行限制,主张经济理性与生态理性的统一。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对历史唯物主义自然观的论述与西方绿色思潮的自然观有着原则性的区别,这对于我们更加准确地把握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以及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性质提供了更为宽广的视野。

第二,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自然观是强调人与自然辩证统一的自然观。无论是生态中心主义还是现代人类中心主义,他们都把人与自然的关系建立在二元论基础之上,要么强调生态系统对人的制约和限制,要么强调人对生态系统的控制和利用,最终导致人与自然的二元对立,根本

无法解决人与自然在现实社会中的矛盾冲突。人与自然的关系在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自然观那里是一个有机体,人类社会与自然是不可分离的,人和自然相互渗透,相互作用,相互改造。因此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反对脱离人类社会历史的抽象自然观,主张历史唯物主义自然观所研究的自然是“人类历史的自然”,自然的异化产生于人类社会中,具体地说产生于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和生产过程中。解决自然异化的根本方法在于实现一场根本性的社会变革。因此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指出,要解决生态危机,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就是要打破现存的资本全球权力关系和变革资本主义社会制度,走生态社会主义道路。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自然观反对脱离具体的社会结构,单纯从价值观维度谈论生态危机的根源以及解决之道,提出以资本为基础的资本主义制度和生产方式的不正义性和非生态性才是生态危机的根本原因,其理论导向了对资本主义制度的生态批判。因此我们可以说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对历史唯物主义自然观的辩护继承了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性方法,拓展了历史唯物主义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向度,推动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现当代发展。

第三,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主张把文化和自然因素引入到历史唯物主义中,建构起文化历史唯物主义自然观理论。他们不仅突出自然在社会生产中的重要地位,强调自然对于人类社会的生产以及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统一具有重要的意义,而且主张文化会导致不同的社会生产力和协作方式,进而导致不同的社会发展进程。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对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中自然和文化因素的重视,把自然、社会和文化看作是一个辩证统一的有机整体,这不仅在理论上拓展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空间,开启了历史唯物主义在文化、自然等领域的研究视域,而且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可以肯定地说,生态危机与我们忽视自然在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作用,以及过分强调经济基础的作用而轻视文化的作用有一定的关系。因此,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所建

构的文化历史唯物主义自然观对于我们从哲学意义上思考生态危机颇具启发性。

## 五、结语

总而言之,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对历史唯物主义自然观的辩护,针对的是西方绿色思潮对历史唯物主义自然观反生态性的诘难,其辩护的实质是强调基于马克思主义立场的历史唯物主义自然观,是认识和解决生态问题的科学理论工具,以彰显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性。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与西方绿色思潮关于自然观的争论,不仅有助于我们正确把握西方绿色思潮自然观和历史唯物主义自然观的理论性质;而且对于我们正确认识自然异化的实质,倡导通过变革社会制度和生产方式来消除自然的异化、解决生态问题,具有非常现实的参考价值。

### 参考文献:

- [1] 王丹. 马克思主义生态自然观研究[M]. 大连:大连海事大学出版社, 2014.
- [2] 劳伦斯·布伊尔. 为濒危的世界写作:美国及其他地区的文学、文化和环境[M]. 岳友熙,译.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5.
- [3] 王正平. 环境哲学——环境伦理的跨学科研究[M]. 2版. 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 2014.
- [4] 胡志红. 西方生态批评史[M].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5.
- [5] 霍尔姆斯·罗尔斯顿. 哲学走向荒野[M]. 刘耳,叶平,译. 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 2000.
- [6] 杨通进,高予远. 现代文明的生态转向[M]. 重庆:重庆出版社, 2007.
- [7] 周玉玲. 生态文化论[M]. 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2008.
- [8] 戴维·佩珀. 生态社会主义:从深生态学到社会正义[M]. 刘颖,译. 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 2005.
- [9] 乔纳森·休斯. 生态与历史唯物主义[M]. 张晓琼,侯晓滨,译.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1.
- [10] Grundmann R. Marxism and ecology[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1.